

邓小平经济哲学研究

曾德盛 主编 胡彩芬 副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邓小平经济哲学研究

主编 曾德盛
副主编 胡彩芬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邓小平经济哲学研究 / 曾德盛主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

ISBN 7-5633-3383-X

I. 邓… II. 曾… III. 邓小平理论—经济学：哲学—研究 IV. A849.1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493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cn>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541100)

开本：890 mm×1 240 mm 1/32

印张：9.75 字数：280 千字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1 000 定价：21.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经济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国外研究得比较多，并在20世纪下半叶陆续出版了一批经济哲学著作。在国内，经济哲学尚处在酝酿初创阶段，对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我们认为，经济哲学就是运用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社会经济运动和经济行为，揭示经济矛盾运动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

经济哲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与哲学和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首先，我们应当明确经济哲学与哲学的联系和区别。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处在人类知识大厦的最高层次。经济哲学从广义上说也属于哲学范畴，但它与一般哲学不同，它是以特定实践领域为对象的应用哲学。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最抽象的概括，它适应于人类的一切实践领域。但是，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人类不同的实践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在战争领域，哲学世界观就具体表现为唯物主义战争观与唯心主义战争观的对立；哲学方法论就表现为军事辩证法与战争机械论的对立。同样，经济哲学不是一般的 worldview 和方法论，而是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经济领域的运用和表现。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是经济运动，是关于经济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因此，经济哲学不同于哲学。哲学与经济哲学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哲学是经济哲学的理论基础，经济哲学则是哲学的特殊的运用和表现，是经济领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其次，经济哲学与经济学也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经济哲学与经济学同是以经济领域中的有关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内容，同是以经济领域作为自己的活动舞台，因此它们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经济哲学与经济学又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一，研究的层次不同。经济哲学是研究经济领域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属于哲学范畴。经济学的各门学科则是研究经济运动某一具体形式的发展规律，是属于具体科学的范畴。

第二,研究的范围不同。经济哲学以整个经济运动为自己的研究范围,它要揭示经济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经济学的各门学科则是以经济领域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局部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发展规律的科学;部门经济学则是研究经济领域中某一部门、某一层次的具体问题。第三,研究的角度不同。经济哲学是从总体上研究经济运动的自身矛盾及其一般规律,而不是研究具体的矛盾发展过程。经济学的各个学科则是研究经济中的各个具体矛盾运动过程,研究各个具体矛盾以及与它直接相关的各种关系和条件。所以,经济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在经济领域来说,也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经济哲学是关于各门经济学的概括和总结,是各门经济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论基础。

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哲学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特殊的研究对象。经济哲学是哲学与经济学交叉的科学,是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点。它是经济学中的哲学,又是哲学中的经济学。

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是近代经济哲学的奠基人。《资本论》就是一部杰出的经济哲学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十分注重把自己的哲学世界观贯彻于经济领域,运用唯物辩证法回答和解决经济问题。毛泽东十分赞赏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研究经济问题的哲学头脑。他在 1959 年底至 1960 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著作来是不可能的。他说:“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① 邓小平作为当代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经济问题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同样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传统。“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的名言。对此,毛泽东曾予以极高的评价。他说:“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

^① 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167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① 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都是照辩证法办事的典范。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面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这一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邓小平不仅多次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形成了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经济哲学思想。

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就其内容来说，一方面，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运用和发展，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另一方面，它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在哲学上的概括和总结。第一，邓小平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现代化建设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主要是违背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脱离实际的“左”的错误。这主要表现在：一是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搞所谓“穷过渡”，即通过生产关系的“一大二公”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二是在经济发展目标和发展步骤上脱离实际，急躁冒进，即企图通过“大跃进”的方法在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三是违背经济建设规律，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搞经济建设。因此，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邓小平首先在哲学上解决了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问题，即重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② 这就把现代化建设重新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邓小平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262—263页，人民出版社，1977。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118页，人民出版社，1993。

就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按照实际情况制定政策。这实际上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总的回答，即哲学的回答，从而在理论上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奠定了哲学基础。第二，邓小平从政治的视角和高度来考虑经济问题。邓小平谈经济问题，“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①。这就是说，邓小平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具有视野广阔、高屋建瓴的特点，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所谓“从政治角度”讲经济，就是着眼于经济的全局性和战略性。邓小平一方面把经济问题提高到政治的高度，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政治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经济的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邓小平所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东西部发展的“两个大局”的思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等等，都鲜明地体现了上述思想。第三，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的核心是研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经济哲学的研究必须服务于这一根本任务。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解放生产力，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的。邓小平认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② 在这里，邓小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不仅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而且阐明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辩证关系。邓小平所倡导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以及其他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和发展哲学的核心。理论研究核心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一致，正是邓小平经济哲学鲜明的理论风格。第四，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的唯物辩证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的重要内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77页，人民出版社，1993。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0页，人民出版社，1993。

容。要搞好经济建设,就必须从国情出发,搞清楚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突出了这个问题。他说:“至于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① 摸准、摸清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是正确处理这些关系的前提。但是,要正确处理这些关系,还要坚持和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防止主观性和片面性。所以,邓小平强调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② 正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邓小平在理论和实践上正确处理了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的唯物辩证法。本书从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上,论述了当代中国经济建设的唯物辩证法——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是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经济问题和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的,以及他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系列经济基本矛盾的哲学方法论。任何事物都是作为过程展开的。邓小平提出“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伟大战略构想,第一、第二步战略目标已经达到了,我们正在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实践的发展呼唤着理论的发展。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谱写着当代中国经济建设唯物辩证法新的篇章。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356页,人民出版社,1994。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249—250页,人民出版社,1994。

目 录

第一章 思想路线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1)
第一节 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全党实现 工作重点的转移.....	(1)
第二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石	(11)
第三节 中国的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殊道路	(27)
第二章 社会主义本质与邓小平的发展理论	(40)
第一节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内涵	(40)
第二节 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核心：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55)
第三节 社会主义本质在现实的展开与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 战略理论	(65)
第三章 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若干矛盾的分析	(85)
第一节 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	(85)
第二节 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	(91)
第三节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97)
第四节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	(102)
第五节 计划与市场	(108)
第六节 速度与效益	(114)
第七节 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	(119)
第四章 改革开放的辩证法	(124)
第一节 改革的辩证法	(124)
第二节 开放的辩证法	(130)
第三节 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137)
第五章 经济发展的历史标准	(143)

第一节	生产力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标志.....	(143)
第二节	综合国力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	(149)
第三节	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是经济发展的最终标准.....	(157)
第六章	邓小平的社会公平观与经济伦理思想.....	(166)
第一节	邓小平的义利观与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取向.....	(166)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道德评价与生产力标准	(173)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	(179)
第七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	(194)
第一节	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的社会.....	(194)
第二节	邓小平关于人全面发展的思想.....	(206)
第三节	“四有”新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18)
第四节	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基本途径.....	(227)
第八章	邓小平经济研究方法论.....	(246)
第一节	创新思维是邓小平经济研究方法论的重要特征.....	(246)
第二节	系统相关分析法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的重要内容	(264)
第九章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辩证法的新发展.....	(271)
第一节	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认识的不断深化.....	(271)
第二节	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辩证法的贡献	(278)
主要参考文献		(298)
后记		(299)

第一章 思想路线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思想路线问题本质上是个哲学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以什么样的世界观、方法论来指导自己行动的问题。思想路线是制定和贯彻政治路线的基础。因此，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有一条根本的、普遍的、长期管用的经验，这就是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概括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第一节 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指导全党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是在一切工作中必须坚持的准则和方法。

一、毛泽东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无产阶级政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恩格斯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列宁也说过：“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确切的、有凭有据的事实作为自己的政策的前提。”^① 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它科学地回答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它不仅坚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且坚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列宁指出：“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230页，人民出版社，1958。

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①列宁的话表明,无论在自然观方面,还是在历史观方面,马克思主义都要求主观符合客观,都要求实事求是,否则就会滑向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与实践都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但没有使用“思想路线”这一概念,因此不能把党的政治路线与思想路线直接联系起来。提出“思想路线”并把它与政治路线直接联系起来的是毛泽东。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逻辑地推演出来的,而是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过程中,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才形成的。

什么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他还指出:实事求是的态度,就要做到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中国是一个比俄国更为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如何把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东方的中国,这是革命史上从未遇到过的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中国革命如何搞,书本上是找不到的,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因而,必须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可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我们党内有些同志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他们只知照抄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和盲目执行斯大林的指示。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332—333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作风,揭露和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作风。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首次提出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这样一种“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反对一切从本本出发的“保守路线”。^① 1936—1937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批判了军事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在《实践论》、《矛盾论》中深刻揭露党内错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思想根源,从世界观的高度批判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强调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1941—1942年初,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这三篇著作中对主观主义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分析批判。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反复阐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根本观点。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在反对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中,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提出来的。由于全党坚持并遵循这一条思想路线,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

建国后,毛泽东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找到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较短的时间里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1956年起,毛泽东试图打破苏联的框框,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希望比苏联搞得更好些、快些。《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这一探索的最初成果。他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亲自开创了中美、中日关系的新阶段。毛泽东还科学地概括和总结了党和人民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整套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如调查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116页,人民出版社,1991。

研究,解剖麻雀,种试验田,走马观花,下马看花,等等。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尽管提出过不少独创性的见解,但从总体上看,他的探索与试验并不成功,并没有从根本上打破苏联斯大林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令人遗憾的是,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左”的思想在我们党内逐渐占据上风,又出现了严重的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倾向。毛泽东在晚年也逐渐地背离了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陷入了主观主义,使我们的理论和政策严重脱离了中国国情,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没有从我国主要矛盾已经改变的实际出发,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我国,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剥削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因此,剥削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已被消灭,阶级斗争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但它已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党的八大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生产上来是完全正确的。可是,由于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和判断,1957年犯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片面总结“波匈事件”的经验教训,仍然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当然就不可能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的重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地搞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使“八大”的正确政策未能真正付诸实施。由于没有着力于经济建设,我国经济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是我们过去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出现的一个严重的失误。

第二,片面强调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企图超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和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头脑发热,片面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在生产关系上大搞“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全国范围的“共产风”,在经济上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在这种不切实际的思想指

导下，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严重泛滥，工农业生产都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导致了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

第三，错误地估计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形势，搞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认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

上述的重大失误，都是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相背离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

二、邓小平为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作出重大贡献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处在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复出工作后，就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邓小平以实事求是为思想武器，最早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我国经历了一个特定的拨乱反正的过程。拨乱反正的一个关键是要纠正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但是，当时个人崇拜、封建迷信之风盛行，要指出、纠正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困难很大。主要原因是，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囿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指导思想上继续坚持“左”的错误，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不破除“两个凡是”，

不破除个人崇拜,就不可能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可能解决一切遗留的重大问题,不可能调动和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也就不可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首先起来推翻“两个凡是”的是邓小平。他在 1977 年 4 月写给中央的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党中央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的这封信,肯定了他的正确意见。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1977 年 5 月,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①把毛泽东的每句话都奉若神明,当作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唯心论观点。邓小平把“两个凡是”问题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加以认识,指出“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②。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打开了禁锢人们思想的闸门,并且成为日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指导思想。

邓小平同志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正确性的根本保证。判定一种言论、主张、思想、理论是否正确,以什么为标准呢?以领导人的思想为标准,还是以社会实践为标准?这本身就是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思想、言论本身是被检验的对象,不能作为检验其真假的标准,只有联结主观与客观的中介——社会实践,才是检验主观是否符合客观、主观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随着拨乱反正形势的发展,要求正面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的问题,但在当时的形势下,还不宜采取直截了当的方式,一场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思想启蒙的讨论开始酝酿。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击中了“左”倾错误思想的要害,这篇文章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39 页,人民出版社,1994。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38 页,人民出版社,1994。

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顿时变得更为尖锐、激烈，许多人赞成，也有人反对。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对实践标准讨论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①他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是随即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也是对历时半年多的真理标准讨论的最好总结。真理标准讨论导致了全国人民思想大解放，为全面拨乱反正，为顺利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使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奠定了思想基础。

邓小平在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斗争中，在推动和指导全党实现工作重点转移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一，他重申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1956年党的八大曾经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现实的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可是，在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否定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正如邓小平所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路线，完全脱离了客观实际，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141、143页，人民出版社，1994。